

# 南诏吐蕃联盟关系走向破裂的记录

## ——赵昌奏状的研究

赵心愚

[摘要]赵昌作为唐安南都护,对当时南诏态度的某些变化应有所了解,与异牟寻在位时的南诏也当有一些接触。赵昌奏状存于樊绰《云南志》中,虽经校订,但讹夺之处仍有。分析奏状的记载,可知南诏派出使者标志着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已将破裂,异牟寻决心已定。奏状内容表明,南诏之所以背蕃归唐,是因为吐蕃在当时已对南诏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

[关键词]赵昌奏状;南诏;吐蕃;联盟关系

中图分类号:K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0)10—0008—05

作者简介:赵心愚(1953—),男,重庆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四川 成都 610041

赵昌奏状,指唐安南都护赵昌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所写的一份奏状。此奏状在异牟寻帛书的探讨中已言及,但未作较深入的研究。这份奏状虽然只有500多字,又为唐地方官员所写,但由于真实记录了南诏异牟寻所遣使者的有关情况,及使者抵达安南后所言,因而对研究当时南诏与吐蕃矛盾的激化及联盟关系走向破裂,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分析这一奏状,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异牟寻此时下决心恢复与唐关系的原因,并进一步理解异牟寻帛书中的相关内容。

### 一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贞元九年五月条载“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往安南的南诏使者,按计划到达了安南府,并见到了时任安南都护的赵昌。在与南诏使者会谈之后,赵昌写了这份奏状,并派专人护送使者及所携物品到长安。其余两路使者到达后,当地官员也应有奏状,但皆不存。

赵昌祖、父皆有名于时,新、旧《唐书》均有其传。《新唐书·赵昌传》载“赵昌,字洪祚,天水人。始为昭义李承昭节度使府属,累迁虔州刺史。”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安南地区出现叛乱,当地卷入叛乱的人可能不少,都护府被围攻,原都护死。为了控制局势,朝廷闻报后决定“以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sup>[1]</sup>安南都护府属唐岭南道,其所辖羁縻府州是唐的组成部分之一。赵昌是贞元七年秋七月上任的,到任

后即着手稳定当地秩序。在任上不到两年,异牟寻所遣使者就到达了安南府。

赵昌出任安南都护之时,正是南诏与吐蕃、唐王朝关系已出现明显变化的时期,尤其是南诏与吐蕃,虽已结成联盟几十年,但此时双方日益相猜,互不信任,矛盾已十分尖锐。就在赵昌任安南都护这一年,因段忠义事件,南诏与吐蕃关系“进一步恶化。”<sup>[2]</sup>(P.109)《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七年五月、六月条载:“……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同卷十二月条又载“冬,十二月,……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给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此事《旧唐书·南诏传》记载亦详,《新唐书·南诏传》则多为删削。一边多取质,一边则愈怨,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在贞元七年显然降到了新低点。在此之后不到两年,南诏正式派出使者赴唐。

安南府地邻南诏控制地区,两地本有道路相通,唐人樊绰在其著作中称“天宝八载,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本定疆界在安宁,去交趾四十八日程,安宁郡也。”<sup>[3]</sup>这条史料记载的是唐军在南诏公开与吐蕃结盟前打击南诏的一次重

要军事行动。需要指出的是,何履光出兵不只是为了安宁城,而是为了与南诏争夺两爨。滇池地区的东爨与西爨各部落之间,内部矛盾一直很多,又由于分属唐姚州、戎州和安南三个都督(都护)府管辖,使矛盾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冲突常有。8世纪30年代,唐加快推进在两爨地区的经营活动,激起这一地区部落叛乱,波及地区日益扩大。为平定此乱,唐利用南诏镇压爨地部落,而南诏则借此机会,将其势力扩大到滇东地区,后又利用矛盾完全控制了此地各部落,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进攻,就是为了打击控制爨地后已有割据之心的南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何履光进攻爨地,就是从安南进兵的,这说明两地早有道路相通。樊绰《云南志》卷一中,记有安南府城至羊苴咩城的水陆路程。《新唐书》中,也记有贾耽所考的安南通天竺道,其中一段,既有水路也有陆路,可能就是何履光进兵所取之道。<sup>[4]</sup> 尽管天宝年后,南诏也向安南方向扩张,但到贞元年间,唐安南都护府所辖地区可能仍有一部分还在今云南境内,与南诏控制地区相邻。因此,作为安南都护,赵昌到任后,对与安南道路相通山水相连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也必然有所了解。在唐争取南诏,瓦解南诏、吐蕃联盟的战略上,安南府虽不及“西抗吐蕃,南抚夷僚”的剑南西川重要,南诏在与吐蕃结盟后多次与之合兵进攻的重点也在西川,但安南府所辖地区也有部分被南诏攻占,因此,在唐对南诏的战略上安南当也负有一定任务。<sup>[5]</sup> 从南诏方面来看,所遣三路使者之一取道安南,说明其沟通重点虽然放在西川方面,但对安南的情况也应是有所了解的,当也有一些往来沟通。从安南府方面看,赵昌任安南都护后,对仍与唐处于敌对状态的南诏不能不设防,各方面均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对已有归唐之心而又仍在犹豫之中的异牟寻及南诏,也当有一些接触,或至少了解南诏态度的某些变化。樊绰之后能在安南收集南诏材料,可证明这一点。在研究赵昌奏状时,我们对南诏、唐与吐蕃三者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形势应有所了解。

## 二

赵昌奏状全文,仅见于樊绰所著《云南志》<sup>①</sup>。樊绰在其书卷末言“臣今于安南郡州溪源首领耆老处借得故蛮王蒙异牟寻誓文一本,安南都护赵昌贞元十年奏状白一本。……今臣谨录故蛮王蒙异牟寻贞元十年誓文及赵昌奏状白,随表奉进以上。”<sup>②</sup>正是由于樊绰的收集抄录和进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昌奏状才得以保存下来。

为便于分析,现先将赵昌奏状抄录于后。“东蛮和使杨传盛等,六月十八日到安南,赍蛮王蒙异牟寻与臣绢书一封,并金缕盒子一具。盒子有绵,有当归,有朱砂,有金。右东蛮国王是故云南诏王阁罗凤孙,姓蒙,名异牟寻。遣前件使赍表诣阙,于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牟寻与臣书,远陈诚恳,并金缕盒子一枚。其使味言,送盒子中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又言蛮王异牟寻积代唐臣,遍沾皇化。天宝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乾陀谗构,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以赞普年少,信任谗佞,欲并其国。蒙异牟寻远怀圣化,北向请命。故遣和使,乞释前罪。愿与部落竭诚归附。缘道遐阻,伏恐和使不达,故三道遣:一道出石门,从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从黔州路入;一道出夷僚,从安南路入。其杨传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从蛮王蒙异牟寻所理大和城发,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杨传盛年老染瘴疟,未得进发。臣见医疗,使获稍损,即差专使领赴阙廷。其使云,异牟寻自祖父久背国恩,今者愿弃豺狼之恩,归圣人之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泽及外夷,故蛮徼遐荒,愿为内属。臣忝领蕃镇,目睹升平,踊跃忻欢,倍万常幸。右蛮王与臣书及金缕盒子等,谨差十将李茂等随表奉进。谨奏。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南都护充管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赵昌奏状。”<sup>③</sup>赵昌奏状存于樊绰《云南志》中,但今通行本《云南志》,实从《永乐大典》辑出,写官之误不少。细读奏状可发现,与《云南志》全书一样,这一奏状也存在一些误字、错字。清代以来,虽经校注者们多次校订,如指出奏状中“贞元十年”应为“贞元九年”等,但讹夺之处当仍有。根据奏状文,以下也试举几处。

奏状一开始便称“东蛮和使杨传盛等”。接下来又言“右东蛮国王是故云南诏王阁罗凤孙”,前后两处称“东蛮”。为何称“东蛮”,读之颇为不解。从其所言来看,所谓东蛮明确是指南诏。查《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对南诏或称蛮、南蛮,或称云南蛮,没有将其称作“东蛮”的。在《云南志》中,也是如此。如《云南志》卷三中,有“今南蛮子孙违负前盟,伏料天道必诛”之语。卷九中,有“近年以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语。而其书卷九、卷十,则名为“南蛮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这说明,曾在安南府任职的樊绰是不会将南诏称为东蛮的。因此,奏状中的两处“东蛮”,应皆是“南蛮”之误。奏状

中东蛮如改作南蛮,与《云南志》全书的提法也就相一致了。

奏状中有三处言及装有信物的金缕盒子,其中两处有量词“赉蛮王蒙异牟寻与臣绢书一封,并金缕盒子一具”、“兼得其王牟寻与臣书,远陈诚恳,并金缕盒子一枚。”金缕盒子可称“一具”,也可称“一枚”,但同一奏状,前后不一,应有一误。这虽不是将南蛮误作东蛮那样的重要问题,但仍有必要指出。

南诏在天宝战争之后,与吐蕃公开结成联盟,《新唐书·南诏传》称之为“北臣吐蕃”。奏状之中,有“天宝年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乾陀谗构,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一语,提法一致。《云南志》卷六中,有“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语,方位亦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奏状接着又言“蒙异牟寻远怀圣化,北向请命,故遣和使,乞释前罪,愿与部落竭诚归附。”此处所说的“北向请命”是指与唐朝恢复关系。《新唐书·南诏传》中称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如果以西川来看,说南诏在其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一奏状,前言“北向归投吐蕃”接着又称“远怀圣化,北向请命”,两处“北向”所指不同,应有一误。

奏状中,有“其使味言”一语,校注者多失校。赵吕甫先生说“‘味言’二字难索解,‘味’字殆有讹误,俟考。”<sup>[6]</sup> (P. 333) 虽指出了这一问题,但并没有作出解释。奏状中有南诏使者的几句话,分别作“其使味言”、“又言”、“其使云”。从其意来看,“其使味言”之“味”当用作“谓”字,其后为“臣曰”二字,即本为“其使谓臣曰”,可能抄字出错。此为樊绰当时抄录之误,或之后的写官之误,已难考证。

与前已讨论的异牟寻帛书一样,赵昌奏状也谈到了吐蕃王朝的内部矛盾及南诏与吐蕃的矛盾,文字虽不多,但为奏状最有史料价值的内容之一。奏状称“以赞普年少,信任谗佞,欲并其国。”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其意与异牟寻帛书中的第二、三忍和第一、二、三难忍的内容一致,且更为直白。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话中的“以赞普年少”几字,可解释为因赞普年幼。仅从文字上看,如此解释并无什么问题,清代以来的校注者也未对此提出过疑问。但是,根据吐蕃史的有关记载,此处可能有误,“以赞普年少”当应为“以赞普年老”,“老”字可能在抄写中被误写为“少”字。虽是一字之差,但此字非常重要,应加以订正。

异牟寻三路派出使者的时间是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此时在位的吐蕃赞普是赤松德赞,

也就是南诏使者在安南府所言的“信任谗佞”的赞普。赤松德赞是吐蕃历史上著名的赞普,被尊为“祖孙三大法王”之一。由于史籍记载上的不同,这位赞普的生卒年存在两种不同说法。据《红史》记载“于阳铁马年生赤松德赞王。赤松德赞从十三岁起执政四十三年,……于阳木牛年五十六时去世。”<sup>[7]</sup> (P. 33、34) 此处藏历阳铁马年即庚午年(公元730年)。按《红史》记载推算,赤松德赞在742年执政,到786年逝世。《西藏王统记》的记载也为赤松德赞生于阳金马年,寿五十六于阳木牛年逝世于宗喀,但即位时间为8岁。<sup>[8]</sup> (P. 119、131) 五世达赖喇嘛对此问题有专门研究。他在其著作中说:“人中圣贤之赤松德赞王也。……故投生为赤德祖敦与金城公主二人之子。时在诸种年,即壬午年。”<sup>[9]</sup> (P. 35) 此处所言之壬午年,即742年。以上两种说法,相差十多年。这两种说法,哪一种较为正确呢?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88大事纪年载:“及至马年(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赞普苏龙猎赞生于札玛,母后芒蒙之薨。是为一年。”“及至猴年·丙申·公元756年),夏,赞普驻于松噶,上赞普尊号‘墀松猎赞’,赞普亲政。”<sup>[10]</sup> 根据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这些记载,刘立千先生认为,《西藏王臣记》所说生于壬午年较为正确。他指出,各书对赤松德赞卒年说法不一,但共同承认他活了56岁。因此,他认为,赤松德赞逝世于797年丁丑是比较可信的,与《新唐书·吐蕃传》有关记载相合。王忠先生的看法也是如此。<sup>④</sup> 除刘立千先生外,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并分析目前的研究成果,有的藏族学者也认为,赤松德赞生于742年,13岁即位,但认为55岁时逝世。<sup>⑤</sup> 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看法已得到多数学者认同。按赞普世系,赤松德赞之后为其子牟尼赞普,即足之煎(藏名举孜赞普)。根据一些藏文史籍的说法,赤松德赞34岁时牟尼赞普出生。刘立千先生认为,若以742年赤松德赞出生计算,其34岁时牟尼赞普生,其生年为774年,仍以此计算,到异牟寻派出使者时,牟尼赞普19岁,此时赤松德赞仍在位。<sup>⑥</sup> 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等的记载,赤松德赞晚年荒于国政,一心崇尚佛法,专心研习佛经,军国大事基本上皆交给大臣,异牟寻帛书中提到的大相尚结赞趁机专权,排斥异己。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正合奏状所言。尚结赞,即赤松德赞晚年信任的“谗佞”。分析异牟寻帛书可发现,南诏对吐蕃内部矛盾是比较了解的,感受也较深,应清楚当时在位赞普的年龄状况。因此,樊绰《云南志》所附赵昌奏状中,“以赞

普年少”当应改为“以赞普年老”。

### 三

赵昌奏状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报告南诏使者到达安南府的有关情况及携带的信物等;第二部分是报告使者的情况及记录的南诏使者在安南府所说的几句与使命有关的重要的话;第三部分是作为奏状应写的有关安排及表态性的文字。这三部分内容中,有史料有价值的显然是前两部分。在异牟寻帛书的探讨中,笔者已根据赵昌奏状中的材料,对南诏三路使者的出发时间及路线、目的地进行了分析,以下再根据奏状中前两个部分的材料谈三个问题。

南诏三路使者三分韦皋所与书为信,除赍表外,还携带有物品。对此,各种史籍虽也有记载,但比较奏状,所记当多有遗漏。《新唐书》载“后五年,乃决策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遣皋帛书曰……且赠皋黄金、丹砂,……献金,示顺革;丹,赤心也。”<sup>[11]</sup>《旧唐书》载“九年四月……使凡三辈,致书与韦皋,各赍生金、丹砂为贄。……所献生金,以喻向北(当应为向唐,本文作者注)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sup>[12]</sup>《资治通鉴》载“九年五月,丙午,……遣使者三辈,……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sup>[13]</sup>据这一奏状记载,南诏赴安南府使者除也携异牟寻致赵昌的帛书(实际也可称作帛书,本文作者注)外,还携有金缕盒子一具,里面装有绵、当归、朱砂、金,并加以说明: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生梗;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非常清楚,盒子里总共有四样物品,此奏状的记载可能最全。这一材料说明,三路使者携带的物品可能不只是两样,而是四样,至少三路使者不是都只携带两样。有学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其从安南入之一路,所携物品与前者(指往成都之一路,本文作者注)大同小异。”<sup>[14]</sup> [P. 286] 细读奏状,这一看法显然与事实不合,数量多了一倍,不能视为“大同小异”。笔者之所以要作这一比较,是因为奏状所言金缕盒子所装物品不是一般礼物,它非常重要,实为可作凭证的信物。<sup>⑦</sup>可以认为,带这几种信物,也是异牟寻向唐表示诚心归附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本身就表明对中原文化的接受,此举作用是为所献表和帛书作补充。南诏背唐几十年来,常与唐兵戎相见,送上“绵”,表示其从此归顺,即所谓“不敢更与生梗”。南诏原在唐统治之下,是唐一手扶植起来的,送上当归,寓意为重又归唐。朱砂与金,同样是向唐表示背蕃归唐决心已定。南诏送上这几样

信物,既向唐表达了归唐的决心,同时也向唐示意与吐蕃已决心分手。因此,从奏状记载的所送四种信物可知,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已将破裂,大计已定,不可逆转。

关于南诏下定决心并最后作出决定派使者赴唐一事,《云南志》和《旧唐书》有较具体的记载。《云南志》卷三载“牟寻不谋于下,阴决大计。遂三路发使”。《旧唐书·南诏传》的记载是“九年四月,牟寻乃与酋长定计遣使。”一是“不谋于下,阴决大计”,一是“与酋长定计”,两书记载看起来不一致。笔者在异牟寻帛书的研究中已指出,两书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所言是此事的不同阶段,先要“不谋于下”,其后才能“与酋长定计”。分析赵昌奏状我们也可以看到,异牟寻在作最后决定时,的确应在南诏统治集团内商议过此大计,所以,赴安南府使者能准确说出异牟寻帛书的主要精神。比如,奏状中记使者言“蒙异牟寻,积代唐臣,遍沾皇化,天宝年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乾陀谗构,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异牟寻帛书为“异牟寻世为唐臣,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举部惶窘,得生异计。”二者比较,使者所言非常准确,有的用语都基本相同。帛书中的四忍四难忍,奏状中使者概括为“以赞普年少(前已讨论,‘少’应作‘老’,本文作者注),信任佞倭,欲并其国”,虽只短短一句话,但意思一样,且十分直白。帛书中为“愿竭诚自新,归款天子。”奏状中言“乞释前罪,愿与部落竭诚归附。”所言也非常准确。赴安南使者所言如此,当然可能与行前的统一要求有关,更与赴唐使者也参加了异牟寻的商议背蕃大计的相关会议有关。在苍山会盟誓文中,可以看到异牟寻曾与清平官、大将军、大首领等密图归唐大计。<sup>[15]</sup>所遣的三路使者,应是异牟寻可靠的心腹之人,其地位也不低,当参加了这样的商议会议,所以对异牟寻的决策十分清楚。奏状证明异牟寻曾召开这样的会议,不仅与誓文合,更重要的是表明南诏当时已决心与吐蕃决裂。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正式结成联盟,对此,新、旧《唐书》有较笼统的记载,《南诏德化碑》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则均有较具体记载。<sup>[16]</sup>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后,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二十年内,基本统一了云南地区,并筑路设治,建立制度。应当指出,与吐蕃结成联盟,使南诏八世纪中期获得了发展机遇,也有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那么,到8世纪末,南诏为何又决心要背蕃归唐呢?对此问题,笔者另作专

门探讨,这里只是根据奏状的材料谈点看法。王忠先生曾指出,“南诏方面绝吐蕃归唐之原因以畏远戎为主。”<sup>[17]</sup>李洁非先生则认为,南诏背着归唐,一是有郑回居中,“使彼倾心中原文化”;一是有韦皋在边,“屡破吐蕃”。<sup>[18]</sup>芮逸夫先生除了认为郑回之劝和韦皋善抚是原因外,还将吐蕃赋役苛重,威胁尤大作为第一原因提出。<sup>[19]</sup>提出这些看法都有其理由,但其依据的材料显然没有此奏状。南诏赴安南使者明确说“以赞普年少(‘少’应为‘老’,本文作者注),信任谗佞,欲并其国。”此话虽短,但已指出了南诏决心背蕃归唐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后,因吐蕃在北线与唐战争不断等原因,南诏基本上保持了政权的完整性,吐蕃对其的控制方式,也不同于其他已征服地区,只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南诏成为附庸。<sup>[20]</sup>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南诏与吐蕃的这种联盟关系,到了8世纪后期有了变化,吐蕃原来只是使南诏成为自己的附庸,到了此时,则是“欲并其国”,也就是进行直接统治。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吐蕃又出现权臣当政的局面。陈楠教授指出:“墀松德赞执政后期,王权已相对衰弱,以尚结赞为代表的强臣把持朝政,一方面任用子侄亲族担任要职,形成错节盘根的权力网络;另一方面,排斥其它豪族,动辄滥行诛杀。”<sup>[21]</sup>南诏在与吐蕃的往来中,了解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这种斗争和对南诏态度的变化,所以异牟寻帛书中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谋”;并从吐谷浑等的结局,直言“每虑一朝,亦被此祸”,为之难忍。奏状中,南诏使者话虽不多,但非常明确道出南诏此时已感到吐蕃“欲并其国”的严重威胁。如果吐蕃的企图实现,南诏的生存都出现问题,继续发展更不可能。因此,异牟寻在犹豫或思考几年后,终于下定决心背蕃归唐,利用唐蕃矛盾,借唐之力对抗吐蕃。奏状中,南诏使者所言的“欲并其国”显然不是其个人的看法,而是异牟寻和南诏统治集团的看法。南诏已感到这样的危险和威胁,其与吐蕃的联盟关系当然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 注释:

①清人所编《全唐文》卷五一四有赵昌《蒙异牟寻请降奏状》,显然辑自《云南志》,但前后有删节。

②樊绰《云南志》卷十,赵吕甫将其归入卷十后之附录一。见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赵昌奏状全文载樊绰《云南志》卷十。见向达《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刘立千的看法见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注314、392,第188—199、200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索南坚赞著《西

藏王统记》注580,第203、204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忠先生的看法见其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2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新唐书·吐蕃传》下的记载是:“(贞元)十二年,……是岁,尚结赞死。明年,赞普死,其子足之煎立。”贞元十三年即丁丑年。

⑤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136、159页,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卒年看法不一,当是根据不同记载或计算方法不同。

⑥刘立千看法见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注第392,第20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⑦[美]查尔斯·巴克斯认为“每个使团都携带着象征南诏忠诚归顺的礼物:生金和丹沙”。这一看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并不是所有三路使者都携带两样,二是携带的不能简单称之为“礼物”。见其著《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第11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参考文献:

- [1]旧唐书·德宗纪[M].
- [2][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 [3]樊绰.云南管内物产[A]//云南志(卷七)[Z].
- [4]新唐书·地理志(七,下)[M].
- [5]旧唐书·地理志(一)[M].
- [6]赵吕甫.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7]蔡巴·贡噶多吉.红史[M].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 [8]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9]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0]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 [11]新唐书·南诏传[M].
- [12]旧唐书·南诏传[M].
- [13]资治通鉴[M].卷二百三十四贞元九年五月条.
- [14]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 [15]樊绰.云南志(卷十)[M].向达.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6]南诏德化碑[A]//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重要碑刻论文[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 [17]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18]李洁非.南诏建国始末[J].边政公论,1944(4).
- [19]芮逸夫.唐代南诏与吐蕃[A]//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M].台湾唐山出版社,1998.
- [20]刘小兵.吐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J].思想战线,1990(3).
- [21]陈楠.吐蕃大相尚结赞考叙[A]//藏史丛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收稿日期:2010-07-08 责任编辑 杨春蓉